

刘畅

春风骤起，又到一年“晒”预算时。政府部门怎样花钱？不管各种预算报表如何晦涩难懂，公众也愿意通过媒体并不专业，有时甚至是一知半解的不精确解读，了解各地财政花销的特点和现状。在北京市陆续公布的提交人大审议的98个部门预算中，有一项并不起眼的悄悄地在财政账本里，名目叫做“舆情监测”。

这笔费用虽说数额不大，但却相当普遍。《新京报》公布的预算表格显示，北京市高院“舆情监测系统”预算70万元，市旅游委“微信微博及新闻监测”90万元，市人社局“舆情监测”89万元，市文管局“舆情监测、微博工作专项”10万元，市红十字会“舆情监测

# “舆情监测”的钱应该怎样花

系统”50万元，市政市容委“网络宣传及舆情应对”20万元，市住建委“舆情监测”31万元，“网络发言人及政务微博运营费”12.5万元，此外，规划、园林等部门也公布了类似预算费用。

看来，不管是法官、城管，还是绿化、旅游、住建等领域的官员，几乎都离不开日渐增大的舆情影响，舆情监测费用成为财政经常性支出项目本身就是政府部门重视网络舆论监督的有力证明。而此前曾有舆论分析，随着舆情监测产业的兴起，各级党政机关已经成为舆情消费的主

要客户，甚至，一些删帖公司把目标集中在受到网络舆情负面影响的部门和官员身上，以近年收取暴利。

重视网络舆情，初衷是及时发现网络舆论中出现的涉及本部门的问题，及时处理对部门和所属官员的举报，防止网络影响下的“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因此，很多政府部门更重视网络舆论危机应对的及时性，不惜花费重金，专人负责，关键词检索，开通微信微博，甚至向社会舆情机构购买各种可供参考的犀利观点和敏感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部门在这笔费用中，还直接列支“媒体宣传和应对费用”，其实，这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封口费。在以往发生的新闻敲诈和封口事件中，一些地方和部门面对媒体记者抓住“把柄”威胁公开曝光的时候，会支付给媒体和记者广告费、发行费、宣传费、好处费等名义的大笔资金，但这些花销一般不会体现在财政决算中，更不是“未卜先知”地出现在预算账目里，而是以下属单位核销、相关企业出资等隐蔽方式处理。

由此可以看到，这些列支的“媒体宣传和应对费用”可能是舆论危机时购买媒体版面、时段的花销。对于相关部门和官员而言，与其暗流涌动、被动应对，不如主动出击、未雨绸缪，过去战战兢兢地支付“封口费”，而今变成政府阳光账本上的公开支出。需要注意的是，一旦网络危机公关成为部门日常花销，并且名正言顺、不断增加，可能会助长舆论交易和媒体腐败。个别官员为了化解危机、逃避责任，可能会以此收买媒体，因此，如何对逐渐增多的舆情监测费用进行社会监

督，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同时，人们发现，越是窗口单位和与公众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部门，往往舆情支出越大。“舆情监测”费用在文物部门要花10万元，到了旅游部门就要花90万元，红十字会花50万元，到了法院就要支出70万元。从这一角度看，舆情监测费用多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部门面临的社会氛围和舆论压力。由此，也需要对舆情产业加强监管，不能让舆情收费变成糊涂账，建立行业标准、收费规范，制止删帖屏蔽、有偿新闻等依靠权力公谋不当利益的做法。与庞大的财政开支相比，舆情监测虽然涉及钱款不多，但毕竟是政府资金投向的新兴领域，需要人大常委会警惕的目光，更离不开审计人员监督忙碌的身影。

# 一个青年公务员的合租生活

本报记者 骆沙  
实习生 杨之光

2014年3月10日，张倩（化名）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帖子：“隔壁‘大哥’因工作调动要离开北京了。走得匆忙，‘大哥’还被某黑心中介扣了4个月的房租。刚回家一看，隔壁已经换人了。中介迅速找到了两位新室友，又得重新适应一遍了。可能生活就是这样吧，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因为年龄最大，在这间合租屋内，刚刚搬走的住客被称为“大哥”。

## 合租房里的火药味

2013年7月，张倩毕业于北京某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目前就职于北京一市属机关。

和绝大多数在京打拼的青年人一样，她的居住环境并不理想。原本两室一厅的房子，客厅被打断。南向主卧租给了一对夫妻，张倩选择了面积较小的北向次卧。“采光差点，但是比主卧便宜几百块钱。”这是主要理由。

已经选择离开“大哥”，原本住在客厅的角落。中介用自制的隔断围了一个半封闭的空间，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连同“大哥”，一起被圈在其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合租者常常会产生各种摩擦：公用厨房和洗手间带来的不便、水电费均摊引发的口水战、“夜猫子”室友大半夜放音乐影响了睡眠……很多时候，张倩都对这几位合租者充满无奈。不久前，她刚刚同“大哥”爆发了一场无言的战争。

这次局部冲突的导火索是采暖问题。这套不足80平方米的两居室并非集体供暖。在冬季漫长而寒冷的北京，自供暖带来很现实的问题：费用较高，而且要租户个人承担。

“粗算下来，如果从早到晚一直开暖气，每人每月要多掏1000多块钱。要是晚上回来开，也得多掏400多块钱。”张倩算过这笔账，“开着，的确省钱；不开，冷得要死。”

作为一个月收入3000元出头的机关新人，她很心疼这笔开支。不过，室友似乎比她更心疼。于是，一向抠门儿的“大哥”与怕冷的江南姑娘间开始了明争暗斗。

一个周六上午，张倩在自己的小屋里贴着暖气包取暖。10分钟后，暖气变得温热；半小时后，微凉；1个小时后，张倩觉得“我比暖气还热”。“开关又被大哥关了。”查看时，她发现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便又打开了暖气。

午饭过后，寒意再次袭来。张倩再打开。于是，整个下午，你开，我关；你关，我再开。“不记得重复了多少次。”她回忆道。

晚饭时分，俩人同时出现在了厨房。张倩明显感受到了“尴尬的气氛”。因为赌气，她故意将水龙头开到最大，目的是“让抠门儿‘大哥’心疼得牙痒痒”。“大哥”也不示弱，把菜叶子摔在地上，让有

洁癖的张倩很不自在。

“一个好好的周末就这么搅和了。”她说，“这样的矛盾几乎隔几天就会出现。可能在他们眼里，还觉得我是个‘刺儿头’呢。搬家计划酝酿了无数次，但最终泡汤。我和父母商量过，他们说的有道理，再怎么换室友，都会有摩擦，何必瞎折腾呢。”

10月的一天，张倩在家洗澡，洗到一半燃气没了。后来她用冷水洗完，第二天便发烧了。“房子的水、电、燃气卡都在中介那儿，他们忘了充值。”她说，“真是想吵架都不知道找谁。”

更让她“上火”的是房屋的门锁。“有一次回家我拿错钥匙了，居然用办公室的钥匙打开了我的房门。我想和室友一起向中介反映问题，结果没人理我。还有就是窗帘的问题。到现在为止，因为墙上没打洞，我的房间连窗帘杆都没有。后来我在墙上贴了一排挂钩，拉了根绳子，总算把窗帘挂起来了。”张倩说。

## “挑了半天，还是被中介坑了”

2013年9月初，张倩接到了北京某市属机关的上班通知。电话里，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集体宿舍？”对方告诉她，没有分房，没有集体宿舍，也没有租房补助。这个答案让她很失望。当时，她还暂住在同学家。好友和同学都在这六七月入职了，张倩找不到熟悉的人合租。

“正规中介一般不提供合租房源，而且中介费也很高，所以我只能在各种网站、论坛上找房子。”那几天，她将能想到的常用网站翻了个遍。“我的策略就是地毯式搜索，找个便宜的好房子。有几次电话打过去，那边的人就说，‘你不是早上才问过我，怎么又打来了？’找得太多，自己都糊涂了。”

最初，她坚持要为自己寻找一套独立的居所。第一次选中的房子是一套单身公寓。房子很小，只放得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但是拥有独立的卫生间、厨房，月租1200元。地点位于东五环外，距离最近的地铁站步行大约10分钟。

不过，实地看房后，张倩发现了很多问题。“安全性不好，公寓里面的人特别杂。要是晚上自己回来，还挺害怕的。而且水电费都是按商用算，整体费用挺高的。”她说。

这次看房下来，她大概明白了行情。“按照我的预算，要想住在地点好、治安好的地方，不太可能租一整套房子。”

虽然极不希望选择合租，但随后，张倩还是开始寻找合租信息。她第二次选中的房子位于东四环外，发布消息的是二房东。这名二房东从房主手里租下了整套房子，自己住在主卧，次卧出租。“1600元一个月，我觉得价格、地点都不错。”张倩说。

但是看房那天，张倩又打了退堂鼓。刚进门，她便被二房东大声呵斥“请换鞋”；走进洗手间，后面的人又大喊“别碰我毛巾”；想看卧室，身后又传来



很多在北京工作的人都经历过“合租生活”。

CFP供图

“别开窗户，风大”的指令。“相处了几分钟，我觉得压力好大。第一次见面都是这样的情况，以往住在一个屋檐下肯定难免争吵。”她认为。

之后的几套房子，要么价格便宜房子差；要么地段好装修好，但价格超支；要么性价比整体不错，但室友很不友善。那一个星期，张倩觉得自己“一直在原地打转，忙碌却毫无成果”。“前前后后看了不下10套房子。”她回忆道。

一天晚上，她很失落地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其实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是觉得委屈。”她说，“如果这个时候在家，应该刚吃完饭，和他们一起看电视呢。”

张倩是家中的独生女，在浙江老家，她有一间很宽敞的卧室，从没想过“在自己家，还要小心翼翼地与别人相处”。

最终，张倩仓促地选择了现在居住的房子。“当时就是着急了，因为马上就要上班了，还得搬家。后来才发现，挑了半天，还是被中介坑了。”她说。

那条房源信息来自某网站。帖子里描述称：全新房源，月租金1000元，集中供暖、地铁沿线。“看照片，房子确实很新，刚装修过的。我觉得价格也合适，就想去看看。”

谁知，见面后，张倩便陷入了被动。“房租一下涨到1600块钱。我说，不是说1000块钱吗，他们说‘打错了，就是这个价’。”一旁陪她的同学劝道：“这已经是我看过最新、最好的房子了。”加上第三天便要入职，张倩急忙交了100元订金。

搬入这套房子后，问题接踵而来。这套面积不足80平方米的两居室，张倩是第一入住者。签合同同时，中介信誓旦旦地说：“放心，我们找的合租户一定都是女

的。客厅不会打断隔，加上你最多住两个月。”很快，新的住户到来：一户是住主卧的夫妻；另一户就是住在客厅隔断的“大哥”。

为了这个事，张倩不止一次打电话质问中介。但对方说：“这事我们控制不了，人家要租也不能拒绝。”

2014年3月，一份《北京青年人才住房状况调研报告》显示，在京工作的青年中，居住自有住房的比例为23.5%，与父母亲戚同住占24.3%，租房居住占52.2%。其中，租房者居住状况相对较差，租房市场侵权现象严重。

“违约、侵权是常有的事。租房者没有任何话语权。你不租，想租的人多的是。”张倩很清楚自己在这份合约中的地位。

新装修的房子，油漆味特别大，没几天她便感觉眼睛刺痛；第一个周末，她被楼上装修的轰鸣声惊醒；小区还没完工，每天进出，都要穿过一条泥泞的便道；厨房没有抽油烟机，因为中介说“要等人住满才给安装”，所以前两个星期只能煮面；洗手间里有一台很脏的二手洗衣机，在洗衣服前，张倩不得不把它先清洗一遍……

“什么情况，客厅‘大哥’的隔板墙居然裂了，装修质量令人担忧。”“两个电梯都停用了？我可是住在17层啊！”“窗户坏了，中介到底什么时候来修啊。”……苦中作乐，张倩不时将自己的合租事分享到朋友圈。“居然有不少小伙伴点赞。”她调侃，“估计不少人都感同身受。”

## 搬家？买房？回老家？

搬家？这个想法在张倩的脑海里酝酿了无数次。但是一想到被中介扣下的押金和房租，她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本报记者 辛明  
实习生 徐晗

人物档案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

对话背景  
近一时期，有关公务员禁令约束较多、福利待遇缩水等话题持续升温。怎样看待中央八项规定给公务员群体带来的影响，如何面对公务员薪酬和晋升体系的改革？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竹立家。

中国青年报：最近一时期，公务员成了社会的焦点，很多公务员以前享受的特权在逐渐减少，你如何看待现在公务员特权被削减的现象？

竹立家：特权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东西，特权是封建时代的东西。公务员就是一种职业，一种正常的职业，和其他职业是平等的。当官为了特权，可以坐轿子，可以娶小老婆，可以随便使用公款，那是封建社会的特权。在社会主义社会，你不应该有特权。在取消一些不该有的浪费、侵占、挪用公共资源的特权后，有人说官不好当啦，当官没意思啦。我们是人民公仆，不是封建官僚，这点一定要弄清楚。所以，我觉得，现在社会上一些人的想法就是有问题的，好像在官就是要发财，不发财就不来；当官我就要享受，不享受我就不来。公务员本来就是一个奉献岗位。

中国青年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一年

“一些人想法有问题，好像当官就是要发财，不发财就不来”

# 竹立家：公务员应该有为国工作的荣誉感

多，带来的变化是什么，这个规定有什么重要意义？

竹立家：最大的变化就是整个社会的反腐信心大幅提高，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高，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大幅提高。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最关键的就是社会的凝聚力，社会的信心，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所以，我们取得的最大成效就是在凝聚民心方面有了实质性的提高。

中国青年报：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公务员想辞职的说法，你怎么看？

竹立家：我不认为公务员辞职是一种普遍现象。公务员在现在的政治经济发展环境中，还是一个好职业。一是公务员薪酬体系比较稳定，虽然工资不高，但职业安全感非常强。还有一个就是，公务员社会福利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比如医疗保障、退休保障，这都是其他职业没法比的。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公务员这个职业可以说是一个最安全的工作岗位。公务员辞职只是个别现象，这在国内外很正常。

公务员应该有荣誉感、奉献精神。比如在日本，公务员能为国家奉献是一辈子的荣耀，社会是很尊重的，这是一个重要原

因。公务员是一个奉献职业，你像美国总统，他的年薪跟比尔·盖茨是没法比的，是因为他的能力差吗？不是，他就是奉献。为国家工作是一种荣耀，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我们现在要宣扬这种精神，不能说当公务员就为了享受为了特权，这个会越来越糟。

中国青年报：你提到过，公务员的晋升制度改革、薪酬制度改革等将会是下一步的重点，这两项工作的难点在哪里？如何继续推进？

竹立家：晋升制度最大的难点就是客观化，通过一种客观的规范的科学的办法来真正把选人用人规范化，这个在全世界都是难题。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现在有一套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他们有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区分。政务官选举产生，事务官直接晋升。所以说，一些国家公务员职位晋升基本上就是两条，一个是资历晋升，一个是绩效晋升。他们没有走后门、看面子、拍马屁、一个人说了算这些现象，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资历晋升是有原则的，公开透明的，谁升职谁不能升职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就是有点儿搞乱了。还有就是绩效，绩效也是

公开透明的，这个没有什么争的。

现在为什么走后门拍马屁这些现象这么严重，公共机构为什么没活力，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晋升机制。大家工作作为晋升，这很正常，但是晋升是领导说了算，那大家就围着领导转了，结果单位搞得乌七八糟的，没有活力，大家都混日子，不好好工作，挖空心思怎么拍马屁怎么送礼怎么钻空子。好多人混日子，得过且过，自我边缘化了，还有人围着领导转。关键就是晋升要规范化、科学化、常态化，要形成有效的机制。曾经有一个专家讲过，资历晋升是所有最坏机制里的最好机制，因为它客观性比较高，不会造成混乱。资历晋升加绩效晋升是将来我们改革的方向。

我们要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路子来思考中国的公务员制度改革方向。能否形成一个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公共权力能不能良性运行，关键在掌握权力的这些人，公共岗位上的这些人。

中国青年报：你曾经在一篇论文中提到，中国由于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形成

了“权本位”、“官本位”的社会结构，流行的也是一种“腐败文化”。那么在反腐倡廉的今天，你认为廉政文化建设有何重要意义？

竹立家：我认为，“权本位”、“官本位”在中国人的心里根深蒂固。两千多年以来，“腐败可耻”在我们的文化根基里面是没有的。我认为，廉政文化建设现在应该形成一种文化氛围、社会氛围。过去，占公家便宜，拿公家东西，甚至贪污，一些人不觉得可耻，好多人甚至羡慕人家。所以说，社会上“腐败可耻”这种观念是不深入人心的。因此，我认为，要消灭官场腐败，首先要消灭整个社会的腐败文化，把腐败观念打消。从宣传教育方面，大力宣传腐败可耻，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小偷从别人兜里掏钱可耻，一些官员利用职权在公家兜里掏钱更可耻。

中国青年报：你怎么看过去一年多的一系列反腐事件？

竹立家：我个人认为这反映了两点：一点就是表明了国家反腐的决心。可以说，通过这一年的反腐，极大地提高了全社会对反腐的信心，提高了政府的威

信，提高了中央的权威，效果总的来说是非常好的。2013年是最近10多年反腐成效最好的一年，也是取得关键性成效的一年；第二点就是，通过一年多的反腐，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在反腐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经验。2014年是反腐深化的一年，可以说，如果2013年是以治标为主的话，那么2014年可能就进入了标本兼治的一个关键年份。在制度反腐方面，可能会继续出台一些有效的反腐措施，真正“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中国青年报：你认为，腐败滋生的根源有哪些方面？如何从根源上铲除腐败的土壤？

竹立家：腐败的根源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公权力的运行过程不够公开透明。第二，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没有非常好地践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把手权力过大，又没人制约或监督，这种现象还普遍存在。所以，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一权独大，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三，在选人用人过程中，划小圈子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考任制、聘任制都还有很多漏洞，很难堵塞。我个人一直强调，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把优秀的人才选到领导岗位上，这是我们一个艰巨的任务。从这些年的经验可以看出，用人腐败造成整个社会公信力下降，对政府的不信任度上升，这是最大问题。第四，公共预算民主化程度不够，公开透明度不够，细化程度不够，造成一些人钻空子，贪污、侵占、挪用公共资源。